

# 必须从改进沟通开始

文：记者史明专访，2017年10月

史明，您是自由记者、时事评论员和顾问。您目前考虑最多的问题或挑战是什么？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正在从双重意义上陷于压力中。一方面，这个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多层次的和自由的相互交往，这种交往肯定不是毫无矛盾的，但却是创新形式的。但是这样一种交往对于政治精英而言却变得越来越“令人生畏”，于是他们愈发深入地尝试去加以限制，比如有将近50个“话题”在网上是禁忌。另一方面，危机也愈加显而易见，最初是在经济方面，但逐渐演变得十分复杂，激化了许多问题，比如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和长期失业率问题。而哪怕只是提出这些问题和其加剧的情况，城市社会都缺少相应的空间和渠道，更何况是以自己的创新型思路去“参与”处理。包括中国在内，在提出城市开发动议时经常强调公民参与。但在中国，就算有公民参与，也只有当精英们认为可以提供“解决方案”时，才有可能。可惜这些精英能提供“解决方案”的情况越来越少，还伴随着越来越大的矛盾，更不用说去实现或贯彻这些解决方案了。

“参与”于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对于参与，在当代中国适用普遍的政治游戏规则：问题的描述和界定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可以讨论的参与可能性之外，部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精英及技术精英都想要保持自己所垄断的最终解释权，但部分也是因为所决定的城镇化政治纲领，反正已经给出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号：所有的问题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问题”，所以不管怎样，都可以归为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从政治传统中，让人民参与提出问题普遍有鼓励抗议的嫌疑。尤其像城镇化纲领这样，已经事先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时更是如此。由于描述和界定问题，即便从“技术层面上”上看，对于解决问题也殊为重要；故而不让公民参与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在

限制他们参与解决问题。尤其在城市里，低碳经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到低碳经济，基本不涉及工业生产，尤其不涉及用电量很高的而现在又大力推进的数字化产业；相反，节能被认为主要是老百姓的职责。让他们参与事先由专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比如向他们分发问卷等，毫无疑问已经是一大进步。甚至这也只在有严格限制的情况下才会进行。而在建设豪华建筑，即政府或大集团或商业中心等代表性建筑时，由于他们普遍被排除在城市“低碳经济”的规划之外，因此在环境和气候保护方面，公民参与解决城市经济问题不过是虚有其表。

### 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城镇化”挑战方面的舆论和趋势？

正如前面所述：自上而下的城镇化以及或多或少“明确”表述的目标，越来越有陷入死胡同的趋势。如今，在大多数大城市，甚至很多中小城市中，数字化的监控网络愈加密集，使得许多人为要逃脱这样的“控制试验”，宁可选择更加孤单。尤其年轻人中这种倾向日益强烈，那就是宁可让人将几乎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乃至娱乐与消遣统统送上门来，也要图个“清静”。如果在更加自由的城市空间里促进人际交往，日渐增多的网络诈骗行为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正是因为城市里的人们越来越主动变得孤单，共同生活变得更加匿名化，才让犯罪分子有了最佳的机会来利用缺乏的微交际犯下自己的恶行。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

史明是记者、顾问、时事评论员。他生于 1957 年，自 1990 年以来在德国科隆、弗莱堡和柏林等地从事自由创作工作。

联系方式：[sming0212@gmail.com](mailto:sming0212@gmail.com)